

法國學者呼籲「重新打造」學校

駐法國臺北代表處文化組

法國中小學在多項新措施與爭議聲中開學。新學年度起，校長對教師甄選有主導權，高二開始適用新版課程，「道德教育」重回小學。另外，教育預算遭大幅刪減，一萬六千個教職遭裁撤。除新版高中課程中「性別理論」單元爭議越演越烈外，亦有學者對課程大綱中「猶太人大屠殺」(Shoah)一詞的用法提出意見。

學校無法避開社會中各種紛擾。在受益於現代化時，學校同時承受社會轉型帶來的種種問題。許多教師感覺，當夜晚來臨時，社會使自己白天在課堂上耐心進行的各項工作功虧一簣。教師參與「昇華個體」計畫的歸屬感煙消雲散。而在全面個人主義的年代，學校如何鞏固集體性？此外，家庭不再是學校的盟友。父母對孩子的溺愛造成「小霸王」或「學生客戶化」等情況。最後，對學校「知識」的認知改變，使「去知性化」情形蔓延到以人文主義為基礎的歐洲大陸。

法國教育學家 Philippe Meirieu 與哲學暨歷史學家 Marcel Gauchet 在一場對談中，深度分析了上述各問題，並提出「重新打造」學校的建議。

Gauchet 首先提出一項常見的錯誤觀念：要求學校透過教學解決社會變遷產生的各種問題。當發現學校對此無能為力時，我們感到不可置信。但事實上，社會集體變遷為學校帶來全新挑戰。學校面臨的主要議題有四：家庭與學校的關係、知識的意義、權威的地位、學校在社會中的地位。

首先，在家庭方面，Gauchet 指出，過去「家庭進行教養，學校傳授知識」的情況不再。學校須同時負起教養與教育的責任。以往依附在「集體性」上的家庭，逐漸「私人化」，改以個人間情感關係為基礎，追求排他的親密利益。學校教育難以融入這種追求個人情感發展的領域。Meirieu 則指出，我們首度處在一個子女多為父母「渴求」而來的社會。過去，家庭生育子女，如今，家庭圍繞子女而生。由於孩子滿足了人們「為人父母」的願望，他們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隨之改變：不想變成「差勁父母」的家長，無法拒絕孩子。而鼓勵消費的經濟型態更加重了這種情況，動搖了傳統的教育系統。

Meirieu 以日前參與國小五年級(CM2)教學的自身經驗為例指出，最令他訝異的，並非學生程度較過去差，而是班級如同隨時將爆

發的壓力鍋，難以維持秩序。教師得採「咖啡館服務生」的方法，不停地向各個學生重述已經告知全班的各項指示。他表示，在「即時通訊」日漸盛行的年代，社會追求能激起即刻且衝動性反應的效果，「上課」越來越難。

其次，對「知識」的認知也有所改變。Gauchet 指出，過去，知識與文化被視為使人類蓬勃發展的方法，涵蓋了最簡單的禮貌到對所處世界的認識，並孕育了民主思想。如今，它們的地位改變，只扮演實用性角色，人類不再需要人文精神。人被「私人化」的潮流淹沒，被鼓勵為自己而活，不需浪費時間去了解週遭人事。「去文化」與「去知性」使學校的處境使得更加艱難。學生總是反問：「知識有什麼用？」他認為，自詡為「知識社會」的現代社會實已不再了解知識的真諦。也因此，社會顯得脫序，人類無力了解週遭發生之事。他認為，我們需要重新找回知識與文化的意義。

而當知識的權威性不再時，學校的權威地位隨之受到質疑。Gauchet 表示，當權威主義消失時，權威的問題便出現了。在學校中，此問題更為嚴重。因為學校除權威外，別無方法：當權力被排除後，沒有其他體制性規定可強制學生學習。過去，教師說服學生的能力建立在社會與國家體制賦予的信任與委託上，教師工作是一種集體性的任務。如今，這種社會契約岌岌可危，教師只能依賴自身魅力，國家不再給予明確的綱領與委託，社會不再給予支持。這導致了學校權威的危機，教師以集體性名義進行教學，但這種集體性卻不再認可教師的工作。

Meirieu 也認為，權威的危機源自於權威「個人化」，不再有社會承諾作為背書。過去，學校賦予教師權威，學校保證，服從教師權威者，就可成功。如今，教師只能自己建立權威，「認真就能成功」的說法已過時。此外，學校也由「體制機構」變為「服務機構」，其中各項交流都以短期利益為考量。家長與學校的信任關係不再，許多家長視學校為「市場」，在其中尋求最佳的學費與子女受教之效益比。他表示，應使學校「重新體制化」，使其成為可激發知性活動的場所，建立可使學生專注學習的儀式。

Meirieu 認為學校應抵抗「即刻與實用性」知識，使學生重新找回「瞭解作品」的樂趣。學校的任務不應被減化為幫助學生獲得各種技能，而是幫助學生學習「思考」。思想的建立須透過對藝術、科學、科技作品的思索，並藉此發現一種分享，而非操控的樂趣。他表示，

瞭解作品是一種知性之旅，與即刻性的工具化知識不同。他指出，由於科技的進步，現在的學生想「知道」，甚至想「全都知道」，卻不想「學習」。學生不再知曉學習可能帶來的樂趣。Gauchet 亦強調，「學習」與「知道」或「認識」不能畫上等號。

Meirieu 批評，追求即刻有效的知識導致了對「能力」的迷思。「能力」展現了學校的生產力，「傳播知識」變成「交易」，忽略了學習實為一種長期過程。他還指出，事實上，法國文化始終偏好「認識」而反抗「學習」，學校唯一的教學法就是「真實地呈現知識」。他表示，知識不能化約為各種必要能力的總合。他批評法國政府提出的「能力與知識基石方案」將各種不同的「能力」，如「能具有創造力」與「能在電子郵件中加入附加檔案」混為一談；這套參考指標使文化的觀念消失，喪失了對「思考」能力的培養。

針對學校面臨的各種問題，Gauchet 認為已到了「重新打造」學校的關鍵時刻。但學校不能孤軍奮戰，亦非單靠幾位教育專家便能解決的問題。他強調，教育問題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，是社會全體的責任。他指出，目前全球教育最令人擔憂的情形是，經濟觀點主導了各種考量。此情況的最佳證明便是經濟合作發展組織進行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(PISA)在各國激起廣大迴響，及法國教育部推出的能力基石方案。Gauchet 表示，在人生各階段與各種活動中，使個體進步的是「思想」。而學校的功能，正是教導我們「如何思考」，向學生介紹由精神層面掌握所從事的各種活動所帶來的樂趣。長遠下來，這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。但目前大眾誤以為放棄這項人文層面才能獲得最具實用性的結果。

Meirieu 亦認為在教育問題上，政策性的動員比起學校單打獨鬥更加重要。他認為教育政策中應該包含家庭問題、媒體角色、成人的影響及世代關係等議題。而目前，最重要的是打造一種「刻意減速」的學校，使學校成為學習思考與體驗集體團結工作的場所。

資料提供時間： 2011 年 9 月

譯稿人： 駐法文化組

原始資料來源： 2011 年 9 月 3 日法國世界報(Le Monde)